

陇上学人文存

黄伯荣 卷

黄伯荣 著 马小萍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黄伯荣卷 / 范鹏总主编, 黄伯荣著, 马小萍编选.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6-04332-5

I. ①陇… II. ①范…②黄…③马…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现代汉语—文集③汉语方言—文集 IV. ①C53②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5977 号

责任编辑: 马晓燕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黄伯荣卷

黄伯荣 著 马小萍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7 字数 341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226-04332-5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编委会

名誉主任：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连辑 咸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委员：连辑 咸辉 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炯 安文华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学术指导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琰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陇上学人文存》编辑部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黄伯荣,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1922年生,广东阳江县人,笔名苗木、莫木。1944年在广东省立两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文理学院中文系。1949年王力、岑麒祥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学系,黄先生转入该系学习,师承王力、岑麒祥、王光焘、杨树达、高承祚等人。1949年9月毕业后考上该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语言学研究生,1951年毕业留在中山大学任教,1954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大学中文系,曾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教研室主任,兰州大学校、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硕士研究生导师,1959年甘肃院系调整,到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两年,又回到兰大。1987年支援新建的青岛大学中文系,在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退休,是青岛大学中文系奠基人。曾任中国语言协会理事(共四届)、中国修辞学会顾问、语文现代化学会顾问、全国高师现代汉语研究会顾问。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IBC)”授予他“1995年度国际名人”荣誉称号,并收入《国际名人传记辞典(第23卷)》。2010年被聘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

黄伯荣教授在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现代汉语教材建设上影响巨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黄先生的学术思想贯穿于该教材的字里行间,影响了一代代学子,是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语言学家。

黄伯荣先生在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语法、方言等方面有很深的



造诣,以语法为主攻方向。先后出版了《祖国的文字》(1954年),《北京语音学习》(1956年),《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1957年),《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7年),《汉字常识》(1959年),《几种念法的字》(1961年),《趣味的中文字》(1961年),《句子的分析与辨认》(1963年)等专著。主编《汉语方言字汇》(合写)(1962),《汉语方言词汇》(1963年),《语法修辞》(1978年),《语法修辞基础》(1981年),《现代汉语》(1979年上下册),《汉语方言语法类编》(1991年),《汉语方方调查手册》(2001)等著作十七部。主编“汉语知识丛书”23分册,论文50多篇。为表彰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突出贡献,教育部、甘肃省、山东省、青岛大学分别授予他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5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黄先生为之贡献30年的兰州大学校史馆“大师云集”专栏共列出百年来全校大师15名,黄先生是其中之一。兰州大学对黄先生的业绩作了计算机录存,这是对黄先生在兰大30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的高度肯定。作为语言学界大师级的人物,黄先生影响深远,他先后辗转多所大学,对每所大学现代汉语的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是甘肃的骄傲,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全才大师”,为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为兰州成为全国语言学科的重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黄先生取得了如此卓越的学术成就,与他成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派的学风有很大关系。

黄先生出生于一个传统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父亲是清末的秀才,曾协助村人办学。在黄先生两周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守寡将其带大,他11岁时就远离母亲到阳江城求学,当时阳江的交通非常不便,要换乘二次车船,转车、步行,一个白天才能到达,可见求学之路的艰辛,但也培养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大学期间师承王力、岑麒祥、方光焘等著名学者,得遇名师,如鱼得水。1949年大学毕业后考上岑麒祥

的研究生,研究领域更广,钻研问题更深。1954年国家教育部调整院系,为加强北大语言学力量,创办了8年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被并入了北大中文系,王力、岑麒祥两位教授和黄先生等老师,带领全系学生乘火车北上,当时黄先生家就住在北大东校门外的大城坊6号。在北大期间,黄先生一家七口,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和稿费维持,夫人曾外出工作,但因孩子太小,无人照看,又无力请保姆,只好留在家中操持家务。夫人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吃苦耐劳,持家有方,当时虽然家庭压力很大,生活拮据,但家庭和睦,夫人还为黄先生誊写了大量书稿。黄先生得以专心做教学和研究工作,无须为家务费心,在北京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就写下了30多万字的著作和论文,迎来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二个丰收期。

50年代,党中央发出了“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教育部也指定北大要支援西北,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向黄先生说明意图后,黄先生欣然同意,决心前往兰州大学开创新局面。黄先生当时36岁,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不讲任何条件,举家搬迁离开美丽繁华的首都北京,来到了当时干旱荒凉的兰州。而且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相比,教学条件的差别可想而知,生活水平更是没法比,每个月粮食指标中搭三成包谷面,半斤大米,这对一个南方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黄先生的夫人不久就出现了高原反应,身体状况很不好,又遇三年困难时期,但黄先生无怨无悔,潜心研究,认真执教,笔耕不辍。作为兰大学术带头人、校系两级学术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带领大家展开研究工作,在初到兰大第一年编成了《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两部教材,解决了兰大长期缺乏自编教材的问题。1960年,黄先生来兰大的第二年,撰写了兰州方言的系列论文,发表了署名黄伯荣、赵峻等的《兰州方言概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兰州方言作全面系统的论述,因此受到了国内外



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引用。此外,还发表了《〈水浒传〉疑问句的特点》(1958年)、《汉语语法研究》(1961年)等论文,出版专著《句子的分析与辨认》(1963年)。其中《句子的分析与辨认》影响最大,当时兰大中文系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该书对读者掌握有关分析和辨认句子的方法帮助很大,该书以及此前黄先生的著述,为后来他被选为全国《现代汉语》教材的主编创造了条件。1963年,黄先生在兰大期间第一次开《语法研究》课,把学生引进语法研究的殿堂,以往兰大中文系语言课还比较陈旧,讲语法也只涉及词法,不讲句法,讲修辞只讲辞格等,黄先生《语法研究》课的开设引领中文系在语言学学科的发展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兰大作为当时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由于地处僻远,办学条件相对艰苦等原因,师资流失严重,由于黄先生支援兰大,从此开创了兰大语言学科的新局面。

“文革”中,黄先生作为兰大中文系学科带头人,语言学界的高产作家,尤其是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黄先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的大帽子,被批斗,被关牛棚,由于多次裸露膝盖跪板凳,致使两个膝盖化脓。夫人也曾遣返回乡,儿女们有的下乡插队,有的去县下工厂当工人,全不在身边。那时兰大的江校长因难以接受莫须有的罪名而自尽,中文系的系主任也失踪了,妻子自吊自杀。平时看着文质彬彬的黄先生表现得异常镇定、坚强,他说“文革”十年虽然没有动过笔头,但从积极的方面看,劳动也把身体锻炼好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坦然面对,当时兰大在甘肃和内蒙古的交界处的荒滩上造田平地,黄先生创造了一台简易水平仪,解决了农场的燃眉之急,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在家还给孩子动手自制秦琴,教孩子弹奏他年轻时喜爱的广东音乐……经过炼狱的黄先生非但没有消沉,反而体魄强健了许多,性格更加坚强、豁达、开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黄先生表现出了经得起磨难的大胸

怀。

“文革”结束以后,一系列政策的落实使黄先生精神振奋,青春焕发,白天上课,晚上伏案著书。黄先生还建立了兰大中文系首批硕士点,旋即投入硕士生的培养工作,并连年招生,同时利用假期举办现代汉语讲习班和研讨会,每期近百名学员,授课专家都是国内有名望的前辈,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汉语工作者。黄先生在兰大期间还创建语言实验室,这在80年代初在全国高校中是有前瞻性的,后来用计算机完成了《老乞大朴通事索引》(1991年语文出版社)、《老乞大朴通事语法研究》和《动词分类和研究文献目录总览》(高教出版社1998年)等著作。

“文革”以后,由于正常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断了十年之久,全国高校的教材大都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1978年高教部将《现代汉语》教材纳入编写计划,黄先生被推为教材主编。从此就有了风行全国的“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

为使《现代汉语》教材有足够的教学参考书,1981—1985年黄先生组织人力物力,主编《现代汉语知识丛书》,内容涉及语言、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25个分册。其中《现代汉语方言》一册被日本光生馆翻译出版。

1987年黄先生支援刚刚诞生的青岛大学,并担任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研究室主任。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编写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和方言语法调查手册的设想,并立即付诸行动,组成编写组,并于1996年出版了《汉语方言语法类编》,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巨著,2001年出版了《汉语方言调查手册》,这两部方言力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黄先生敬业治学,淡泊名利,1991年从青岛大学退休后,仍然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笔耕不辍,除了主编《类编》及《手册》以外,还发



表了创见颇多的《框架核心分析法》等论文,这对于建立一套切合汉语实际、适合计算机信息处理的汉语语法体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11年7月18日—7月20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主办的“高等院校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教材教法研究会暨黄伯荣九十华诞庆典”在中山大学隆重召开,黄先生精神矍铄,认真听取与会者的意见,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现代汉语教材教法的学术探讨中同庆黄先生九十华诞,必将成为中国语言教学界的一大佳话,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代表以及黄先生弟子到会,祝贺黄先生九十华诞,高度赞扬了黄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生品格。黄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棵长寿树,无论在学术还是在精神上都洋溢着大师的风采!

黄先生是一位让人敬仰的老一辈语言学家,他丰硕的学术成果在以下几个方面尤显突出:

一、主编的高校《现代汉语》统编教材,自1978年开始持续至今,在国内外影响深远,面世30多年以来风行全国

《现代汉语》统编教材自1978年纳入教育部编写计划到1979年出版发行以来,总发行量达500万套,年发行量在全国同类教材中位居榜首,打破了历史纪录,创造了奇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半个中国的文科大学生都是黄先生的“学生”。它以科学简明、生动流畅的内容让我们如沐春风,使我们在众多的教材中记住了它,也让我们感到了现代汉语的无穷魅力,很多人都是受这套书的影响走上了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之路的。当时全国各地不断有同类的教材出版,但该教材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1986年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优秀图书奖;1987年获甘肃教育厅颁发的省高校优秀图书奖。除省级奖励以外,得到教育部的奖励就有4次:1986年教育部刊物《高教战

线》发表了一篇《一部受欢迎的现代汉语教材》，对此教材作了充分的肯定；1987年颁发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1999年审定并公布其为文科推荐教材；2006年，又将其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文革”结束以后，百废待兴，被停开近十年之久的现代汉语课得以恢复。原来各高校使用的是1962年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统编教材，时隔多年，不少内容有待重新修订，重新编纂势在必行，各高校自发组织编写的新教材、讲义，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1978年由郑州大学张静先生等三校教师发起的全国现代汉语协作会（先后在郑州、昆明）召开，当时全国60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黄先生以他深厚的功底和丰富的编写经验，被推选为《现代汉语》全国统编教材第一方案（兰州版）的主编，廖序东为副主编。张静和刘世儒为第二方案（郑州版）的正副主编。1979年3月，两套教材的定稿会议分别在兰州和郑州同时召开，“兰州本”顺利定稿，并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试用本。1980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兰州本《现代汉语》专家审稿会在青岛举行。由教育部函请吕叔湘、周祖谟、张志公、胡裕树等10多位专家审定通过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获教育部任可。1981年出版正式本，学术界称之为“兰州本”或“黄（伯荣）廖（序东）本”。20世纪80年代各省高校本专科自主选定教材，后经调查发现各高校及省自考办普遍选用兰州本。从问世到至今，黄廖本教材何以能一直受到师生的欢迎，它的与众不同在哪里？

1. 反复修订，与时俱进

黄廖本教材遵循传统、恪守基础但并不墨守成规。为了与时俱进，这本教材出版以来先后进行了八次修订，每次都吸收学科新成果。从开始的37万字，增加至现在的61万字。就反映新成果而言，如果把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体系算作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话，黄廖本已在增订二版（1997年）和增订三版（2002年）中逐渐吸



收，增订四版则在明确加以定义并概括介绍之外增加了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以及变换分析等新内容，这在同类教材中并不多见。

2.海纳百川，吸取精华

黄廖本《现代汉语》是黄先生学术研究的代表作，虽属于集体编写，但黄先生的学术思想贯穿于该教材的字里行间。在编写这套教材之前，黄先生就先后出版了专著八本，主编三部著作，写了大量的论文，并且一直工作在教学的第一线，所以黄先生在现代汉语教材建设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绝非偶然。这是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科研贮备的外在呈现。为了使教材更加完备，黄先生听取各方面意见，黄廖本教材参编者之多，提意见之众，请提意见的渠道之广，也为国内教材所少见，从各版的前言里可以看出，国内本专业的大师和专家几乎一个不漏。黄廖本教材不仅争取到很多专家的指点，而且虚心向广大教师请教，通过暑期现代汉语讲习班，召开现代汉语研讨会来征集意见，黄先生非常重视一线教师的意见，吸取其精华，作为历次修订和增订的参考。

为了使教材更加完备，黄先生博览群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修订以后的语法体系都是黄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书中增加了宾语的对应成分“动语”，使语法学术体系更加科学完整，析句体系也继承和创新并重，从中心词析句法到修订本改为层次析句法，始终都坚持既讲层次又讲中心的原则，析句过程简括为16个字：从大到小，基本二分，寻求枝干，确定句型。阐述语言规律时常一正一反，相互比较，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析句体系。继承与创新并重，在先后八次修订过程中不断完善，教材的学术质量不断提升。有人说黄廖本教材有三好：好教、好学、效果好。这也是黄先生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教材内容对“讲什么、讲多少、怎么讲”三方面的问题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内容完备、分量适中，系统分明，重点突出，要求明确，使这部教材具

有简明适用、雅俗共赏、适用面广泛的特点。

1980年朱星教授在审阅本教材时看到了这些思路，就曾预言：此教材今后将取代现有最流行的教材。这并不是溢美之词，30年以来已成为现实，创造了同类教材出版发行的奇迹。

黄先生退休后被母校中山大学聘为兼职教授，黄先生深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他与廖序东先生的“黄廖本”需要不断地充实新内容。廖先生2006年仙逝，黄先生虽已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带领中山大学并联合相关院校共十余位教师，编写了新的《现代汉语》教材，该教材于2012年上半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称为“中大本”。“中大本”《现代汉语》，虽以“黄廖本”为蓝本，但对内容进行了整合、充实，前面一部分为基础知识部分，适应所有学习现代汉语的学生，后面一部分加入了新的研究成果，为“延伸”内容，可根据教学对象和要求进行灵活取舍，适合更高层面的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学习，这是新时期黄先生对现代汉语界的又一重大贡献。

二、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

三年困难时期，黄先生在兰大工作期间，于1963年出版专著《句子的分析和辨认》，在兰州大学及甘肃语言学界影响很大。本书着重谈句子成分与句型的分析辨认方法，并拿一些文章依次作句子成分分析与句型分析，提出了相邻和易混的成分、句型的辨认方法，书中把黎锦熙等人适合成分分析法“原句加符号法”的析句符号加以修改，并逐步改造成为同时也适合层析分析的“线条括号表示法”，为后来大学教材和《中学教学语法系统(试用)》所采用。该书对读者掌握有关分析和辨认句子结构的知识和方法帮助很大，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多次重印。

黄先生1958年发表专著《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一书，在此书中首先说明人们为了表达思想感情，就要使用不同用途的